

# “活态”还是“活化”？

——关于活态遗产概念泛化的辨析与思考

王龙霄

近年来，“让文物活起来”成为文博领域的共识与行动。在这一背景下，“活态遗产”的概念被频繁提及，其应用范围也从最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性文化景观，不断向各类文化遗产扩展。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不少早已失去原有功能、传承业已断裂的考古遗址、历史建筑等遗产，在被重新赋予旅游、展演等新功能后，也被媒体、项目方甚至部分管理者称为“活态遗产”。这种概念上的泛化使用，虽出于强调遗产当代价值的美好初衷，却可能导致核心概念边界的模糊，进而影响保护理念与实践的精准性。

## 活态遗产的生命状态和传承机制

“活态遗产”对应的英文为 Living Heritage。在国际遗产文献谱系中，它的定型经历了从“物质真实性”到“文化过程性”的转变。1994年的《奈良真实性文件》打破了以材料为核心的真实性判断，将文化传统的延续性纳入遗产价值的评判体系。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则进一步阐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特征在于世代相传，并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环境、与自然和历史互动中不断被再创造。这种定义所指向的，正是一种活态的文化过程。

因此，严格意义上的“活态遗产”，其核心标识并非简单的“正在被使用”，而是维系其生命的内在传承链条依然在运转。它包含两个不可分割的要素：其一，存在一个与遗产直接相关的“核心社群”，他们是遗产的创造者、传承者和意义赋予者，而非仅仅是被动的使用者；其二，遗产所承载的核心知识、技术、信仰或社会功能，通过口传心授、身体实践等方式，实现了“不间断的连续性”。即便为了适应时代而发生形式上的变迁，只要这一内在传承机制仍在运作，它依然是“活态”的。

这种基于社群、依靠持续实践而自我更新的生命状态，是“活态”的第一要义。中国的红河哈尼梯田、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等世界遗产，正因其延续千年的农耕传统和与其伴生的知识体系、社会组织依然充满活力，才被认定为杰出的“活态遗产”典范。而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则提供了另一种活态样本。西湖并非纯粹的自然湖泊，而是历经千余年持续疏浚、营造和文化层累而形成的“文化湖泊”。从唐代白居易筑堤、宋代苏轼浚湖，到历代对“西湖十景”的营造与题咏，这一系列实践从未因朝代更迭而真正中断。更重要的是，围绕西湖所形成的城市与湖泊的

共生关系至今仍在运转：湖山空间依然是杭州市民日常游憩、礼佛、雅集的文化场所，龙井茶的种植与炒制技艺、描绘西湖山水的中国画传统、与之相关的诗词传说仍在传承。西湖的“活态”不在于某一具体建筑的恒久不变，而在于人与湖山持续互动的文化过程从未断裂，景观的物质面貌虽在历史中不断被重塑，但那份根植于社群生活的审美情感和栖居方式，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延续性。

## 遗产活化的外部赋予性

与上述“活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考古遗址与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无论是罗马斗兽场举办的现代音乐会，还是景德镇陶溪川由宇宙瓷厂再生为文化地标，抑或隋唐洛阳城应天门遗址上恢宏的灯光秀、良渚遗址公园内精致组织的公众考古和数字展陈，都属于这一类实践。这类遗产地的共同特征是：其原本的功能体系——无论是作为礼仪与权力中心、工业厂房、军事要塞还是生产生活空间——已在历史进程中彻底终结。与之相伴的原生社群早已消散，或与其历史功能的关系已经断裂，维系其运转的传统知识、制度和日常实践也一并中断。它们被埋藏、废弃或闲置，成为历史进程的遗存。

今人对其进行“活化”，本质上是在遗产的物质载体上或空间中，植入新的、现代的、外来的功能。这是一项由遗产管理者、规划师、设计师、商业运营者主导的“外部干预”工程。其目的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历史遗迹融入当代生活，发挥教育、审美、经济等新的社会功能。这无疑赋予了遗产地“二次生命”，让其从荒芜的废墟或闲置的旧屋变为富有生机的公共空间。这种实践当然值得高度肯定，也符合“让文物活起来”的时代要求。但从遗产本体与其文化母体的关系来看，它所创造的是一个崭新的现代文化现象，而非对历史生命脉络的接续。它“活”的是新的功能，而不是那个早已中断的、原初的传承之“态”。

## “活态遗产”概念泛化的风险

将“活化”成功的遗产地不假思索地划归“活态遗产”名下，带来的并非只是修辞上的不严谨，更潜藏着保护理念和方法上的深层风险。

首先，这种泛化可能模糊“活态遗产”保护的价值观核心。活态遗产保护的最高目标，是确保那种能让传统在当代持续生长的“生态系统”完好无损。这就要求将

管理权和决策权很大程度上交还给遗产的主人——传承社群，保护措施要服务于他们维持生活方式、延续文化实践的历史权利。而一处功能已完全置换的遗址或历史建筑，其管理围绕遗产安全、游客体验和多功能运转，核心利益相关方往往不再是遗产的原生社群。倘若将二者混为一谈，用管理“活化遗产地”的思路去干预一个真实存续的活态村落或传统技艺社区，极有可能造成其内生机制的破坏，加速其文化生命力的流失。

其次，对“活态遗产”的泛化赞誉，可能会在无形中弱化对那些“不太好看”、游客不多但真正“活着”的遗产的关注和资源投入。一个仍有居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村落，其文化价值在于日常生活的绵延，而不在于视觉上的“活气”或经济上的“活性”。一个被成功改造为精品酒店的古民居，从商业经营和大众影响力来看，可能远比前者更具“活力”。若不加辨析地将两者纳入同一评价维度，很容易形成一种错误导向：似乎只有被商业成功“激活”的遗产才更有价值。这将在实质上偏离活态遗产概念创立时为未被纪念碑化的社群文化争取话语权的初衷。

## 活态遗产与遗产活化的守正创新

面对这一现象，学界和行业需要共同持守概念的精准性，同时又不因术语之辩而否定活化实践的创新意义。

首先，在理论话语层面，有必要明确区分“活态遗产”与“活化遗产地”两个概念。“活态遗产”对应国际通行的 Living Heritag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框架内正式使用的术语，有其成熟的文献脉络和明确的指涉对象。它本质上是一个本体论概念，界定的是遗产“是什么”——一种内在传承机制仍在运转、社群仍在场的遗产形态。而“活化遗产地”并非一个现成的国际术语，它源自中国大规模遗产活化利用实践的现实需要，是一个方法论概念，描述的是遗产“被怎样对待”——经由外部干预、被植入新功能，其核心指向的是一种保护利用模式。

建议将严格意义上的 Living Heritage 保留给那些传承从未中断、社群依然在场、核心功能自我延续的文化遗产。而对于功能断裂后经由外界干预、被植入新用途的考古遗址、历史建筑等，可称为“活化利用的文化遗产地”或简称为“活化遗产地”。这并非价值高下之分，而是类型学上的必要厘清，避免政策制定和保护规划时产生混淆。

其次，在方法应用层面，可以创造性地借鉴活态遗产方法，但需明晰其适用边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近年来积极推广的“活态遗产方法”，强调理解遗产延续至今的动态功能和利益相关者网络。对于活化遗产地，这一方法中的社区参与、利益相关方协商等工具可以被借鉴，但运用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里的“社区”通常是遗产地周边的现代居民，他们与遗产形成的是新的关系，而非历史传承关系。方法可以借鉴，但对象的属性判断不能模糊。

第三，在任何传播和评估中，都应追问几个根本问题：这是谁的遗产？谁是其文化生命的主人？传承它的核心知识与实践的那条链条是否依然存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正是区分“活态”与“活化”的核心尺度。

认清两类遗产的差异，不是要分出高下或厚此薄彼，而是为了更精准地各按各的规律去保护、去活化。对于活态遗产，保护的核心是维护其内在传承机制的延续性，尊重社群的主体地位，避免外部力量对文化生态的过度干预。而对于活化遗产地，其生命力恰恰来自外部的创造性介入。实践证明成功的活化利用不仅让沉寂的遗产重新融入当代生活，更创造了新的文化意义与社会价值。活化遗产地所需要的，是兼容历史信息保存与现代功能植入的弹性策略，是平衡真实性要求与当代使用需求的创造性智慧。这一领域的探索，正是中国遗产保护实践对国际遗产学界的重要贡献。二者同为当代遗产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守正与创新，恰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从“活着的遗产”到“活态遗产”，概念的演进本是为了更精准地捕捉那些根植于人、绵延于日常的文化生命力。它所捍卫的，是那些尚未被历史进程隔断、仍与文化持有者血脉相连的活的文化肌体。当下对考古遗址、历史建筑等遗产进行活化利用，让凝固的历史重新参与到流动的现代生活，无疑是了不起的文化创造。然而，正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两种同样珍贵但性质迥异的遗产形态，我们更需要在概念上守其边界，在方法上明其差异。唯有如此，才能让正在延续的文化火种得到尊重与悉心守护，不被外在的“活化”模式所干扰；另一方面也让那些已然沉寂的伟大遗迹与旧日建筑，在获得光彩熠熠的“二次生命”时，其价值定位更加清晰而坚实。这既是对学术严谨性的要求，更是对每一种遗产形态及其背后不同主体的真正尊重。

# 文博赋能城市更新与高质量发展

——武汉革命博物馆的探索实践

崔媛媛 吴婕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化的今天，文博事业已超越传统的收藏与展示功能，日益成为城市文化传承、社会教育与经济创新的重要引擎。武汉革命博物馆作为武汉规模最大的红色教育基地，下辖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毛泽东故居纪念馆、中共五大纪念馆暨陈潭秋烈士早期革命活动旧址纪念馆、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展、武昌起义门旧址共五处场馆，其中四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馆藏文物 2.8 万件（套），年接待观众超 200 万人次。该馆以“筑基—求解—笃行”为路径，聚焦品牌建设，坚持保护、创新、发展并重，在标准化管理、人才锻造、资源融通、品牌传播、数字科技、区域联动与融媒建设等多维度系统发力，以文博力量深度赋能城市更新与高质量发展。

## 以标准化筑基，构建现代化博物馆治理体系

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始于管理的科学化与规范化。武汉革命博物馆在全省红色场馆中率先启动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化建设项目，严格对标《质量管理体系要求》(GB/T 19001—2016/ISO 9001:2015)标准，成立由馆主要领导挂帅、业务骨干全员参与的工作小组，并邀请专业机构全程指导。通过系统梳理全馆流程与制度，构建起以综合管理手册为统领，服务通用标准、服务提供标准、服务保障标准、岗位标准为主体的“五位一体”标准化体系，累计编制 133 个标准化文件、20 余万字。该体系首次统一了全馆 9 项基础业务术语，明确 72 项工作制度，覆盖藏品征集、文物保护、陈列展览、公众服务、社会教育、安全管理、文创开发等近 20 个细分领域，并构建“制度—流程—表单—记录”四维联动机制，实现业务闭环与全程可溯。2025 年 11 月，武汉革命博物馆顺利取得认证，建立起全周期制度体系与持

续改进机制，为博物馆参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 以创新强人才，锻造文博复合型专业队伍

人才是博物馆事业的核心动能。武汉革命博物馆深挖红色旧址资源，创新推行策展人制度，打破传统岗位固化壁垒，择优遴选政治素养过硬、专业扎实、思维活跃的青年骨干组建策展梯队，赋予其独立策展、统筹落地、联动对接等全流程权限。策展团队立足馆藏特色，贴合公众文旅需求与时代传播导向，自主构思主题、创新叙事形式、优化服务场景，持续推出主题鲜明、形式新颖的原创专题展览。展览项目负责制实施以来，年轻干部主动认领任务，跨领域协作攻坚，已高质量完成 6 个专题展览的全流程策划与落地，在实践中锤炼了队伍，厚植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根基。

## 以融合拓边界，搭建全域联动育人平台

武汉革命博物馆立足丰厚红色资源，坚持开放办馆，融通社会力量，构建全域育人新格局。馆校融合方面，发起成立湖北首个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联盟，打造“红巷里的思政课”教育实践品牌，通过“理论+文艺+实践”组合育人模式，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紧密衔接。文旅融合方面，与武汉文艺院团共创“武汉 1927 沉浸式思政课”，将情景演出引入革命旧址，打破舞台边界，让革命旧址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景舞台”。研学融合方面，引入社会资源精心打造“红巷学社”研学品牌，形成标准化课程体系，并面向研学机构等发布，搭建行业交流合作桥梁。未来还将联动京沪、湘鄂赣等地红色场馆，发布红色主题游径，进一步激活红色文旅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

## 以品牌塑形象，释放红色文化传播效能

品牌建设是博物馆参与城市文化对话的重要载体。武汉革命博物馆持续深化“红巷有礼”“红巷有理”“红巷有你”公众服务品牌。在文创领域，引入优质机构合作共建“红巷书屋”，成功打造为武汉城市书房；累计注册商标 30 个，登记美术作品著作权 4 个，设计红色文创产品 50 余款，不断丰富文化消费供给。在学术领域，依托“我在红巷讲党史”IP，细化“红巷里的思政课”“红巷里的诗词党课”“武汉 1927”沉浸式思政课、红巷书香等多个子品牌，举办“红巷讲坛”与“新春第一训”，编纂出版《中共五大旧址保护修缮研究》《数字化传承》等系列著述，系统构建学术成果体系。在志愿服务领域，组建由“红巷爷爷”“红巷青马”“红巷苗苗”构成的老中青三代志愿者团队，目前成员超 4000 名，深度参与讲解、策划与咨询服务，年服务观众 30 余万人次，让红色文化广泛惠及人民群众。

## 以科技护根脉，筑牢文物安全与活化屏障

面对革命旧址保护与现代化科技融合的课题，武汉革命博物馆运用数字化手段赋能文物保护与活化。扎实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采用无人机倾斜摄影、三维激光扫描与 HBIM 技术，建立革命旧址全要素数字化信息档案，形成文物“三维实景一张图”，实现旧址建筑三维数字化重建。依托国家文物局重点项目，运用高精度三维建模、OCR 识别等技术，对馆藏文物实施毫米级精度的全息信息采集，构建多维数字档案系统，并借助人工智能辅助的大数据平台建立数字孪生系统。同时，引入“物联网+智慧消防”系统，在文物建筑关键部位部署智能传感器，实时采集与分析数据，为每座建筑生成“消防安全画像”，推动文物安全从“被动

应急”向“主动预防”转变。

## 以联动促共享，赋能区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武汉革命博物馆主动加强区域性纪念馆协作，牵头成立湖北省博物馆协会纪念馆专业委员会，联合省内 28 家成员单位，共同打造“红色荆楚”品牌，在学术研究、展览策划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策划实施“砥柱中原——湖北抗战文物主题联展”等项目，打破地域界限，实现资源共享与价值共创。同时，积极建立跨省展览合作机制，开展展览互换与联合策展，扩大优质展览的辐射力与影响力，以文化联动助力区域城市群的文化共荣与品质提升。

## 以融媒扩声量，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

在信息时代，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力深刻影响着城市文化的影响力。武汉革命博物馆深化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各级主流媒体合作，打造全媒体宣传矩阵。同时，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自媒体平台，推出“主创带你看新展”“文物说”“红巷里的思政课”“红巷书香”“守护与传承”等系列宣传栏目，多渠道、立体化传播红色文化。目前，博物馆每年被各级官方媒体报道 200 余次，自媒体推送 600 余条，稳居“中博热搜榜”全国热门纪念馆及革命类博物馆百强前列，持续提升城市红色文化品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武汉革命博物馆以系统化思维和高质量实践，将红色资源保护、人才队伍锻造、社会教育创新、品牌传播拓展与数字科技应用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文博赋能城市更新的特色路径。这不仅是一座博物馆的自我革新，更是城市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以文化厚度塑造城市品格、以文博力量驱动城市进步的生动样本。

(作者单位：武汉革命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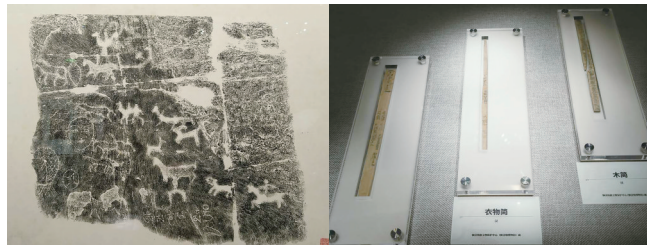
## 基层传真

### 光荣与辉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 80 周年图片展

“光荣与辉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 80 周年图片展”近日在邯郸市博物馆开展。1946 年 5 月 15 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该报紧跟解放战争进程，宣传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心声，记录解放区建设的生动实践，凝聚起攻坚克难、奋勇向前的磅礴力量。伴随时代洪流，又先后来到西柏坡、进入北京城，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是今天《人民日报》的重要前身之一。展览通过展出近百幅珍贵历史影像和旧报档案图片，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回溯晋冀鲁豫《人民日报》风雨砥砺的发展历程，深情诠释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坚守初心、不负使命的理想担当，娓娓讲述邯郸沃土上不能忘却的辉煌历史。



### 美在阿拉善——岩画与居延汉简艺术展



“美在阿拉善——岩画与居延汉简艺术展”近日在衢州市博物馆开展，精选近百幅内蒙古阿拉善盟发现的岩画，以实物标本、拓片等形式展示给观众，内容涉及动植物、牧猎生活、迁徙征战、图腾崇拜、文字符号等，揭示了古代草原先民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信仰。居延汉简作为长城边塞文化的重要载体，与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明清大内档案并称 20 世纪中国档案界的“四大发现”，展览精选 32 枚汉简，并以岩画之象与汉简之文相互交织，呈现古代先民丰富的生活世界与深沉的精神信仰，勾连起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脉络。

### 营造江南——杭州与宁波的宋代官式建筑美学



“营造江南——杭州与宁波的宋代官式建筑美学”展近日在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开展，通过“皇家宫殿”（德寿宫）与“江南厅堂”（保国寺）两大官式美学体系并置，构建了一种“和而不同”的江南叙事。展览汇集杭州、宁波两地多家文博机构的百余件展品，包括建筑构件、考古出土文物、古籍文献、模型及数字展项等。其中，宁波保国寺大殿下昂（1084 年墨书题记）、迦陵频伽脊饰、雷峰塔“官”“王”“天下”铭文砖、1:2 复原的保国寺东山梁架模型及瓜棱柱模型成为现场最受关注的展品，通过严谨的学术梳理与展陈语言，向观众呈现宋代建筑制度与人文精神的双重高度。

### 繁花通衢——花木纹饰里的盛世与对话



“繁花通衢——花木纹饰里的盛世与对话”展近日在旅顺博物馆开展，以旅顺博物馆丰厚典藏为基础，精心遴选近 200 件馆藏珍品，以花木纹饰为独特视角，系统梳理了牡丹、梅花、莲花、松、竹、卷草纹、宝相花等经典花木纹饰的发展脉络、精神内涵与吉祥寓意。展览不仅展现了“岁寒三友”“梅兰竹菊”等纹样所承载的东方文人品格与审美理想，也深入解读了牡丹、梅花、芭蕉、桃、葫芦等纹饰中蕴含的民间生活愿景，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大量文物实证，清晰揭示了石榴、葡萄、莲荷、宝相、卷草等纹饰在东西方文明中的融合与演变，生动诠释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的永恒主题。

本版责编：续红明 王娟 李端